



乡村振兴中的海归力量(7)

在鄱阳县谢家滩镇元宝山，树木郁郁葱葱，气候温和宜人。到了秋天，山上的吴茱萸结出一片片绿籽，格外好看。2012年，当余贻谋第一次和朋友来鄱阳考察时，就被这里优良的生态环境吸引。他留学于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计算机专业，毕业后曾在香港工作、生活过一段时间。这一趟鄱阳之行后，没过多久，他就打定主意，要搬到鄱阳，创建中药材种植基地。当初几乎没人相信，他会一路坚持将近10个年头。



余贻谋（右）指导农民做好冬季中药材枳壳枝叶修剪和管理。

在江西省鄱阳县，余贻谋如今已建立起4个中药材种植基地，吸纳周边农户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IT专家成了中药行家

本报记者 孙亚慧

“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这里山地平缓，种植中药材有利于机械化生产。”来鄱阳考察时，余贻谋一路上没说太多话，但他将当地种植中药材的优势默默记在了心里。“我觉得有戏！”他说。

2012年，余贻谋创办了江西元宝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从IT专家转型开始种植中药材。虽然鄱阳长久以来就有种植中药材的传统，但发展规模并不大。想要建设专业的种植基地，进行机械化生产，余贻谋需要自己摸索经验。

从租山头开始，余贻谋事事亲为。从上山开荒、平整土地，再到重新修路、建厂盖房，余贻谋都做过。



2021年11月30日，余贻谋正在整理采摘好的皇菊，准备用于制作菊花茶。本文图片摄影：卓忠伟

然而，想要坚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真的并不容易。由于缺乏中药材的选种经验，余贻谋在创业之初没少遇“坑”，资金也因此而损失不少。他买进一批药材种苗，原本该在种下的第三年开红花，结果，漫山遍野的红花让大家伙全都傻了眼，余贻谋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有人“出主意”说：虽然品种不纯正，但仍然具备一定药性，可以“凑合卖”，不然就全都砸手里了。余贻谋听了非常生气，坚决不同意这么做。“以次充好的事咱们什么时候都

不能做！种药材要为他人的健康负责，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他带领大家把这批种苗全部连根拔除，重新种上了正宗品种。

中药材种植周期长、资金回笼慢，往往不能很快见到收益。眼见这条创业路不知何时才能看到曙光，余贻谋的另外3个合伙人不免渐生退意，他们先后撤离离开了团队。元宝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成了余贻谋一个人的公司。

“我自己是有中医药情结的。药是治病救人的必需品，用心种好药，这比做IT有意义。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我应该花时间、花精力把它做好。”余贻谋说。

“多用新技术解决‘老问题’”

中药材种植基地的收成好坏与气候条件息息相关。2013年，余贻谋栽种的140万株白芍因缺乏专业管理，3年下来就只剩下9000株左右；套种的400亩小麦颗粒无收；基地里的枳壳也常常被冻、减产。

余贻谋意识到，中药材对种植技术要求很高，想要护理得当，必须要请来专家“把脉”种植过程。为此，他专门从江西、安徽、湖南等多省请来了十几位技师，分别负责吴茱萸、黄栀子、枳壳、贡菊等不同药材的种植和养护。与此同时，余贻谋还投资300多万元用于购置推土机、开荒犁等机械设备，全部按照机械化标准对种植基地进行改造。

“善于思考和解决问题”，是不少种植户和公司员工佩服余贻谋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中药材基地建设过程中，余贻谋不只是购置设备，他还带领大家研发新设备，不断创新种植方法和技术。“我们每天面对着土地和大山，

常常遇到新的问题，我就想着怎么能用新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多用新技术解决‘老问题’。比如能不能改装一些机械设备，提高生产效率？因为种植面积越来越大，人手就变得不够用。”他说。

几年时间里，余贻谋带领公司员工设计制造出了药材园专用的智能施肥机，使用了超声波液位传感器技术，还有自动栽树苗机、双向自动施肥机等设备，有效提高了种植基地的工作效率。

为了深入学习更多有关中医药理和种植知识，2018年，余贻谋考入江西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重新做起了学生。余贻谋将自己实践中积累的种植经验与书本相结合，从“半路出家”变成了行家，并由此结识了更多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

“你种多少，我们就收多少”

如今，余贻谋已在元宝山及周边地区建立起4个种植基地、2个工厂，用于种植吴茱萸、枳壳、皇菊等10多个品种的中药材，种植面积过万亩，其中吴茱萸和枳壳是江西省最大的单一品种种植基地。

对于公司未来发展，余贻谋深知要延长产业链，深层次挖掘中药材的价值。“现在我们的产量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接下来需要拓展药材加工，做成品，以此来提高产品附加值。”

黄精——这味常见的中药，给了余贻谋新的想法。“黄精药食同源，功效不错，种植加工的市场前景广阔。我们正在试种，也在摸索种植标准。”说起中药来，他如今已是如数家珍。

始终相信先进技术对中药材种植的重要性，余贻谋一直走在技术应用的前沿领域，试种药材的物联网大棚就是例子。大棚内，黄精的生长温度和湿度都由智能系统控制，无需人工调节，药材的生长环境信息会被全程记录。

如何带动周边农户继续增收，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余贻谋心中已经有了计划：他准备拿出4000亩种苗，免费提供给乡亲们种植；提供免费的培训机会，提高乡亲们的种植知识和能力。

“等到药材成熟了，我们统一收购，再为种植户打开更多销路。你种多少，我们就收多少，不必有任何顾虑。”他自信地说。

“先生始终以国家发展为己任，不仅在天文学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还为青少年科技人才的发现和培养拼尽全力，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回想起不久前代表恩师王绶琯先生出席“德耀中华——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颁奖仪式”的情景，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韩金林动情地说。

天上有一颗国际编号为3171号的小行星，名叫“王绶琯星”，标注着王绶琯在天文领域的杰出贡献。1952年，正在伦敦大学天文台工作的王绶琯收到时任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邀请后，立即决定回国开创新中国的天文学事业。

经过艰苦努力，王绶琯和同事们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将中国的授时精度提高到百分之一秒，为中国授时以及天体测量研究跻身国际先进行列奠定了基础。自此，“北京时间”响彻祖国大地。

王绶琯曾长期主持我国天文学的总体发展，领导研制成功中国首台射电天文望远镜等多种重要观测设备，取得了多项巡天观测科学成果。2008年，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LAMOST)在河北兴隆建成，这是王绶琯和几代科研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借助于此，人们对宇宙天体光谱的获取效率比以往提高几千倍，使得我国在银河系研究居于国际领先地位。

除了前沿科学研究，王绶琯还经常在中、科技馆、天文馆讲学座谈，编著了大量受青少年喜爱的科普读物。

上世纪九十年代，王绶琯曾经同一些高三学生谈论大学志愿，这些中学生都不打算未来从事科学研究。王绶琯陷入沉思：“中国还有多少青少年愿意在科海遨游？”

1997年，王绶琯致信北京市科协青少年部部长周琳，称他在科普活动中接触过的许多优秀学生，后来无声无息了。“作为前辈的我们这一代人，反躬自问，是否也有失职之处？应该有一个组织，给他们领路。”

1999年，由王绶琯倡议，钱学森、王大珩、路甬祥、白春礼等61位著名科学家（其中院士45人，“两弹一星”科学家5人）联合发起成立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以下简称俱乐部）。俱乐部组织学有余力、有志于科学的优秀高中学生，利用课余和假期“走近科学”，求师交友，然后“走进科学”，到国家一流实验室体验科学家团队的科研活动，开启了科技人才早期发现与培养的探索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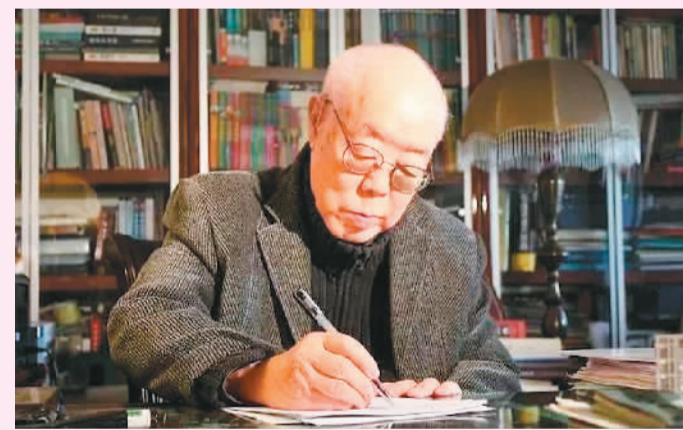
俱乐部成立之初，王绶琯四处沟通合作细节。“不能把俱乐部的活动当成考试竞赛的‘敲门砖’。”从俱乐部成立时起，王绶琯就坚决反对掺杂任何应试教育、应赛教育的思想和做法。

“如果每年平均能有100名‘可能的科学苗子’参加科研实践，其中有2%—3%日后会成为顶尖人才，那么经年累月，效果还是可观的。为保住这些‘可能的科学苗子’，我们没有理由不尽力。”王绶琯说。

经过22年发展，俱乐部基地校由最初的4所发展到31所。先后有721位导师和5万多名中学生参加俱乐部的科研活动，其中3100多名中学生走进278个科研团队及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平均为期一年的“科研实践活动”。一批俱乐部早期会员已在各自领域崭露头角，一些学生成长为国际科学前沿领军人物。

在二十多年中，王绶琯为俱乐部的发展四处奔波。为解决俱乐部的经费问题，他捐出了全部稿费，并自费购买大量书籍捐给甘肃、青海等偏远地区的学校。及至身体虚弱无法行走，他让女儿推着轮椅参加俱乐部活动。即便躺在病榻上，自称“眼睛、耳朵都开始罢工”，这位被孩子们称为“科学启明星”的老人仍在关心着俱乐部的未来：“中国要强盛，科技必须自立自强。我们尽力根植一片深厚的土壤，让科学之树枝繁叶茂。”

2021年1月28日，98岁的王绶琯与世长辞。追思会上，没有哀乐，一曲《夜空中最亮的星》在大厅中循环播放，也久久回荡在人们的心中。



王绶琯在工作中。

引领孩子走进科学的「启明星」

北京天文台原台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绶琯

本报记者 施芳



拨打
邮局订阅服务电话
11185



微信扫码登录
中国邮政-微商城
订阅

登录
中国邮政网上营业厅
(<https://www.11185.cn>)
订阅

2022年度
四种订阅方式
任您选!

国内代号：1-96
全年定价：420元

拨打
人民日报海外版
发行服务热线
8610-65369416

欢迎订阅